

· 巴以问题 ·

知识工具与权力话语：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地图的排他性构造*

闫 涛

内容提要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将地图作为一种知识工具以表达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故土的空间构想，同时这类标识性地图的传播与推广也在全世界犹太人中引发了情感共鸣，并吸引他们移民巴勒斯坦。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开始以国家意志推行地图的希伯来化改造，目的是将犹太民族的历史与现代地理意识充分融合。最终，以色列用希伯来语重新命名了数以千计的地点与景观，这为犹太民族集体认同与以色列国家建构提供了“合法性”依据。但究其根本，以色列此举是打造专属于犹太人的排他性空间，巴勒斯坦人的生存权遭到漠视与排挤。无论是以色列建国前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主体，还是以色列建国后以官方为主体推行的地图策略和实践，均将巴勒斯坦地理空间塑造为“他者”，制造了一种“存在与空白”“进步与退化”“安全与恐怖”的空间秩序与话语体系。由此而言，地图不仅作为一种知识工具促成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的构建，更代表着一种权力话语参与到巴勒斯坦地区空间的竞争博弈之中，因此成为考察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冲突的重要维度。

关键词 巴以问题 地图 犹太人 以色列 巴勒斯坦

作者简介 闫涛，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以色列研究中心博士生。

自 1648 年《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以来，以民族国家为单位划分领土空间逐步流行并成为世界秩序的核心原则。地图因具有将三维立体的现实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招标项目“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关系全史”（24VLS025）阶段性成果。

域转化为二维平面空间的特性，塑造了人们对民族国家轮廓的概念化认知，成为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认为，地图通过将土地空间转化为可识别的标志有助于培养一个民族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并且其中所包含的文字、视觉符号与民族历史、遗迹的相互叠加促成了民族国家作为“想象共同体”的出现。^① 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在欧洲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兴起。作为一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及政治文化运动，其核心旨在打造一个民族历史与土地紧密联结的集体认同，而地图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开始利用地图唤醒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生存空间的想象。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以国家意志使用地图声明乃至占有土地一直是其重要的技术性手段，也使得巴以双方围绕到底谁拥有这片土地的生存空间这一核心问题产生了没有硝烟的“地图战争”。

巴以问题是影响中东地区国家间关系的长期性难题，尤其是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局势持续恶化，以色列内阁又于2025年8月8日批准了全面占领加沙的动议，该问题由此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关于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竞夺空间及其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大国政治的遗产、^② 第一次中东战争导致巴勒斯坦人的流离失所^③、以色列的定居点建设^④等现实空间层面。实际上，双方在一些象征性、文化性领域的竞

① See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2006.

② David Fromkin, *A Peace to End All Peace: The Fall of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New York: Holt Paperbacks, 2001; Jonathan Schneer, *The Balfour Declaration: The Origins of the Arab - Israeli Conflict*, New York: Random House Publishing Group, 2010; James Barr, *A Line in the Sand: Britain, France and the Struggle That Shaped the Middle East*, London: Simon & Schuster, 2011; 刘中民：《20世纪大国政治与巴勒斯坦问题的悲剧》，载《西亚非洲》2024年第3期，第56~78页。

③ Benny Morris, *1948: A History of the First Arab - Israeli Wa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hmad H. Sa'di and Lila Abu - Lughod, *Nakba: Palestine, 1948, and the Claims of Mem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7; Eugene L. Rogan and Avi Shlaim ed, *The War for Palestin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194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Itamar Rabinovich, *Waging Peace: Israel and the Arabs, 1948 - 200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④ Rashid Khalidi, *The Hundred Years' War on Palestine: A History of Settler Colonial Conquest and Resistance, 1917 - 2017*,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20; Ilan Pappé, *The Ethnic Cleansing of Palestine*, London: Oneworld Publications, 2007; Ian Black, *Enemies and Neighbors: Arabs and Jews in Palestine and Israel, 1917 - 2017*, London: Allen Lane, 2017; Robert I. Friedman, *Zealots for Zion: Inside Israel's West Bank Settlement Movement*,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4.

争也相当激烈，围绕地图展开的博弈就是典型案例之一。传统观点认为，地图是精准无误和价值中立的科学产物。因此，部分学者认为地图就是作为这样的一种知识工具促成了以色列的国家建构。^①而事实上，人们对于地图的盲目信任被称之为“地图催眠”（Cartographic Hypnosis），这导致人们缺乏对其真实性与客观性的界定与批判。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以地图史学家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等人发起的批判地图学（Critical Cartography）不断发展完善，其核心理念是挖掘地图绘制背后隐藏的知识与权力的互动及其生产机制。^②在地图与现代民族国家的交互关系之中，政治权力始终置于地图的核心地带。^③无论是以以色列建国前以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为主体，还是以以色列建国后以官方为主体推行的地图策略和实践，都是为了打造专属于犹太人的空间愿景，通过将巴勒斯坦地理空间塑造为“他者”，极大地忽略、漠视和压制巴勒斯坦人及其空间存在。正如著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认为的那样，“空间是任何权力得以行使的基础”。^④

基于此，本文在吸收借鉴前人既有研究基础上，系统性考察地图作为知识工具与权力话语的复合属性，尝试探究地图作为知识工具如何唤醒犹太人的民族家园构想与强化犹太人的集体身份认同，以及地图作为权力话语怎么样使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有不断成为既成政治事实，并且不断割裂、抹除巴勒斯坦人同这片土地的联系和印迹。

一 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空间构想

旗帜、图标等图形符号是塑造意识形态的重要知识工具，而地图因其独

① See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Dov Gavish, *The Survey of Palestine Under the British Mandate, 1920 - 1948*, London: Routledge, 2005; Denis Wood,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0; Yoram Bar - Gal, *Propaganda and Zionist Educatio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1924 - 1947*, New York: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03.

② 批判地图学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由地图史学家布莱恩·哈利等人发起，并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完善。批判地图学反对将绘制的地图视为客观中立的空间知识，而是认为地图在历史上一直是为了维护和支持统治阶级的利益而制作的。

③ Christine Leuenberger and Izhak Schnell, “The Politics of Maps: Constructing National Territories in Israel”,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Vol. 40, No. 6, 2010, p. 804.

④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 - 1977*,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 252.

特的空间可视化特性在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中具有特殊意义。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派别和团体为表达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生存家园的构思，常依据《希伯来圣经》中所描述“应许之地”的空间范围绘制地图。这类地图唤起了流散犹太人的情感共鸣，无形之中提升了他们的现代地理意识。

公元 135 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起义完全失败后，大批犹太人被迫逃离巴勒斯坦向世界各地迁移，犹太历史由此进入了长达 1 800 余年的民族大流散时期。^① 在漫长的流散时间中，回归故土的夙愿在犹太文化中引起共鸣。犹太人通过宗教仪式、故事、传说以及日常生活中的隐喻等方式，把自身塑造成流亡的难民，十分渴望回归民族历史上“流着奶与蜜”的圣地。^② 其中圣地主要指最具象征与符号意义的耶路撒冷和西墙，也包括《希伯来圣经》和《塔木德》中犹太圣贤的坟墓等。在犹太教的影响下，尽管犹太人对这些标志性地点产生了情感依恋，但还没有发展出一种基于民族主义的土地意识。正因如此，“应许之地”更多地存在于犹太人的礼拜仪式和神圣文本之中。

犹太复国主义的兴起推动了犹太人由向往宗教圣地到回归现代意义上民族家园的转变。尤瑟夫·萨尔蒙（Yosef Salmon）说：“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教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对流散和救赎的观念、态度上。”^③ 1896 年，犹太复国主义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所著《犹太国》的出版，标志着犹太复国主义开始冲击犹太教的救赎观——弥赛亚主义，这意味着犹太人无需被动等待，通过移民定居巴勒斯坦也可得到民族自救。与此同时，为了建立现代意义上民族家园以结束群体流亡，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积极地构思、设想他们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具有希伯来文化的民族空间。^④ 1897 年，第一次犹太复国主义大会在瑞士巴塞尔召开后，犹太人将地图作为一种宣传手段进行了初步利用。到了 20 世纪 20 年代，犹太人对地图的使用频率激增。多个犹太复国主

① 张倩红著：《以色列史（修订本）》，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 50 页。

② Zachary Lockman, *Comrades and Enemies: Arab and Jewish Workers in Palestine, 1906 - 1948*,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 22.

③ Yosef Salmon, "Zionism and Anti - Zionism in Traditional Judaism in Eastern Europe", in Shmuel Almog, Jehuda Reinharz and Anita Shapira eds., *Zionism and Religion*, 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1998, p. 25.

④ S. Ilan Troen, "De - Judaizing the Homeland: Academic Politics in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Palestine", *Israel Affairs*, Vol. 13, No. 4, 2007, p. 874.

义组织将代表犹太民族故土的地图印制在锡盒、海报、邮票、旗帜和游戏玩具等载体之上。^① 此后，这类地图逐渐演变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用以表达巴勒斯坦作为犹太民族昔日故土的重要象征性标识。^②

其中，一些犹太复国主义机构、派别和团体在地图运用方面的表现尤为突出。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是利用地图普及巴勒斯坦作为犹太人家园最具代表性的机构。^③ 基金会所设计的地图印制在被称为“蓝盒子”（Blue Box）的锡盒之上，该盒子是为犹太人在巴勒斯坦购买土地筹集资金的募捐箱。为了筹集分散在不同国家、地区的犹太人捐款，盒子上的文字采取了相对应的语言，即英国和美国使用英语，中欧主要使用德语，东欧使用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④ 尽管它的目标语言各不相同，但为了凝聚犹太人的募捐热情，盒子的设计采用了最能代表犹太文化的元素。锡盒的整体颜色以蓝色和白色为基调，这源自于犹太教祷告时披肩的颜色，现在也成为以色列国旗的颜色。^⑤ 盒子的一面是象征着古希伯来王国权力的大卫王之星，另一面是象征着犹太人家园的地图。地图所显示的区域向北到黎巴嫩，向南延伸到沙漠地带，西边是地中海，东部是约旦河。^⑥ 蓝盒子作为募集犹太人回归故土资金的捐款箱，成为散居犹太人和巴勒斯坦土地之间深厚联系的桥梁，吸引他们提供财力支持。地图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元素，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组织、仪式以及各类活动中被赋予了神圣的地位。它与其他珍贵的犹太象征物品，如安息日蜡烛一起被放置在犹太人的家庭、社区中心、学校以及会堂之中，并在不断展演中逐渐渗入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意识。对犹太人而言，蓝盒子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上面的地图向全世界犹太人传递了明确的空间构想与领

① Maoz Azaryahu and Ahron Kellerman, "Symbolic Places: 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Zionist Mytholog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24, No. 1, 1999, p. 112.

② Boaz Neumann, *Land and Desire in Early Zionism*, Massachusetts: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239 - 240.

③ 犹太民族基金会于 1901 年在巴塞尔举行的第五届犹太复国主义代表大会上正式成立。它是一个非营利和非政府组织，旨在为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在以色列重建民族家园，最开始通过筹款用来购买和开发土地，之后开展植树造林和基础建设等项目。

④ Yoram Bar - Gal, *Propaganda and Zionist Educatio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1924 - 1947*, pp. 30 - 31.

⑤ Yoram Bar - Gal, "The Blue Box and JNF Propaganda Maps, 1930 - 1947", *Israel Studies*, Vol. 8, No. 1, 2003, p. 19.

⑥ Yoram Bar - Gal, *Propaganda and Zionist Educatio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1924 - 1947*, p. 83.

土主张——“这是犹太人的土地”。^① 地图所呈现的地理范围不仅对应着具体的土地诉求，更通过这种空间具象化的方式满足了犹太民族渴望结束千年流散、实现回归故土与民族复兴的精神诉求。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同样利用地图表达其空间构想与土地夙愿。泽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作为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他将地图视为犹太人重建民族家园的重要工具，还积极推动了1935年第一部希伯来语《巴勒斯坦地图集》的编纂、出版。亚博廷斯基明确提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是“在约旦河两岸的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人占多数的民族家园”。这一主张直接映射于地图的绘制逻辑之中：通过省略地图中的边界线，塑造出了一个横跨约旦河两岸的犹太民族家园形象，充分反映了“大以色列”的空间愿景。^② 同时，这种地图叙事与他的“铁墙”（Iron Wall）理论互为照应。该理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若要成功，必须通过军事威慑构建一道“铁墙”，迫使阿拉伯人接受犹太国家的存在，“铁墙”的防御范围需覆盖约旦河两岸的全部领土，否则军事威慑无法生效。亚博廷斯基主导的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地图绘制，实质是“铁墙”理论的空间化表达。通过构造地图上无明显边界的状态，为“铁墙”的潜在扩张预留“合法性”。^③

1929年，融合了犹太复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理念的犹太青年团体组织（HaMahanot HaOlim，希伯来语中意为“上升者营地”）成立。为彰显自身独特性，该组织对原有的会徽进行重大调整：最初的图案由象征农业劳动的镰刀、代表丰饶的葡萄藤叶、寓意防御的箭矢组成，后被替换为一张覆盖约旦河两岸、黎巴嫩南部、内盖夫沙漠全境及埃拉特湾的地图，会徽的底部铭文写着“Alo na' aleh”，意为“让我们上升”。它是源自《希伯来圣经》中的典故：摩西派遣12名探子探查迦南地情况，其中10人宣称迦南人强大而不可战胜，约书亚和迦勒则持有信心。迦勒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④ 实际上，该团体借用圣经典故直白地宣示了他们对犹太人占有

① Ronen Shamir, *The Colonies of Law: Colonialism, Zionism, and Law in Early Mandate 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7.

② Ofira Gruweis-Kovalsky, “The Map as an Official Symbol and the ‘Greater Israel’ Ideology”,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53, No. 5, 2017, pp. 11–12.

③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至今，这种空间上的意识形态持续影响以色列右翼政党对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政策。例如，2023年以色列推动的司法改革中涉及定居点的合法化条款。

④ 《民数记》13:30。

大片土地的强烈意愿与信心，而地图所划定的区域就是他们所构想的犹太民族空间范围。^①

总体而言，通过考察这些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与派别的地图实践可以发现，地图作为知识工具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吸引全世界犹太人精神与物质支持的有效手段。地图所呈现的强大符号象征功能不仅塑造了“巴勒斯坦即犹太民族家园”的地理想象，更从情感维度驱动了流散犹太人的回归浪潮。^②以至于每艘驶抵巴勒斯坦港口的客轮都载有成批受到未来民族国家地图影响的犹太移民，他们自愿投身于“应许之地”的家园建设。^③对犹太人而言，地图的空间表征不仅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对巴勒斯坦的领土主张具象化，更是完成了犹太民族身份与土地的再次绑定和“联姻”，从而推动《希伯来圣经》中的“应许之地”向着现代主权国家的空间实体转化。^④但其中巴勒斯坦人的生存之地在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空间构想下没有一席之地，这也成为日后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矛盾纠葛不断深入的关键因素。

二 以色列建国后对地图的希伯来化改造

文本符号是地图传达信息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包括地名、图像的文字标题以及在地图中嵌入特定含义的相关文本。^⑤1948 年以色列建国后，开始以国家意志推行地图的希伯来化改造，系统性地对地图文本符号变更。伴随着国家的新生，大量希伯来元素的文本在地图上也得以“复活”。在这一过程中，以色列用希伯来语重新命名了大量的地名和景观，其目的是为以色列的国家构建提供充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实际上，以色列对地图的希伯来

① Ofira Gruweis - Kovalsky, "The Map as an Official Symbol and the 'Greater Israel' Ideology", pp. 5 - 7.

② Yoram Bar - Gal, *Propaganda and Zionist Educatio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1924 - 1947*, p. 40.

③ Donna Robinson Divine, *Exiled in the Homeland: Zionism and the Return to Mandate Palestin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9, p. 6.

④ Yoram Bar - Gal, "Maps and Nationalism: A New Reading of the Atlas of Israel", *Horizons in Geography*, Vol. 55, No. 7, 2002, p. 25.

⑤ John Pickles, "Texts, Hermeneutics and Propaganda Maps", in Trevor J. Barnes and James S. Duncan eds., *Writing Worlds: Discourse, Text and Metaphor in the Representation of Landscap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p. 217 - 222.

化改造也是一个地图的去阿拉伯化进程。

（一）以色列建国后地图希伯来化的改造进程

1948 年之前，巴勒斯坦地区流行的地图及其中的地名主要以阿拉伯语命名。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巴勒斯坦地区诞生了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和两个地理上分离的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这种新的政治现实催生了地图的改变。根据时任以色列内政部长伊扎克·格鲁恩鲍姆（Yitzhak Gruenbaum）的说法：“为了犹太人扎根于新生的国家土壤之中，必须从地图的希伯来化开始”。^① 大体而言，以色列的地图希伯来化运动经历了 3 个发展阶段。

在第一阶段，1949 年以色列政府成立了一个负责为内盖夫沙漠地区赋予希伯来语名称的委员会，其目标是将重塑内盖夫的阿拉伯景观作为创建新国家希伯来地图的起点。^② 这一时期该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为以色列内盖夫地区的所有山脉、山谷、泉水、道路等确定希伯来语名称。同年 6 月，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访问内盖夫后认为，内盖夫地区的地图希伯来化是将其纳入以色列领土主权的第一步。委员会确定了希伯来语命名的五大来源，分别是犹太历史名称、《希伯来圣经》中的名称、直译阿拉伯语名称、与阿拉伯语发音接近的名称以及新的象征性名称。该委员会成立 8 个月后，共计 560 个希伯来语名称在新的内盖夫沙漠地图中得以确立。^③

在第二阶段，随着地图希伯来化在以色列南部内盖夫地区的顺利推进，原有委员会于 1950 年向以色列政府提议将命名活动扩大到全国范围。1951 年，以色列成立了政府命名委员会，决定从整体上为以色列国绘制一幅新的希伯来化地图，并系统地为构成所有国家景观的地理特征确定希伯来语名称。至 1955 年，政府命名委员会已在地图上重新标注了重要的山脉、河流和土丘的希伯来语名称，并绘制了比例尺为 1:250 000 的国家地图。根据 1958 年的数据，以色列政府命名委员会已确定了约 3 000 个希伯来语地名，最终完成了一张比例尺为 1:100 000 的地图。随着地名命名的进程不断推进，绝大部分的地

^①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Vol. 27, No. 2, 2001, p. 184.

^②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Zionist Homelands (and Their Constitution) in Israeli Geography”, *Social & Cultural Geography*, Vol. 5, No. 3, 2004, p. 503.

^③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pp. 185 – 186.

点都完成了希伯来语命名。^①

在第三阶段,1967 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的领土控制范围扩大到“绿线”之外。当以色列占领了约旦河西岸、东耶路撒冷、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戈兰高地,地图的希伯来化也由此拓展到这些“被占领土”。这一时期,以色列政府命名委员会也按照官方的要求继续对新占有的土地进行希伯来语命名,并与此前的地图名称风格保持一致。^② 以色列为了制造“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将地图上的“绿线”抹除,这种地图绘制的实践强化了一个没有巴勒斯坦人的巴勒斯坦地理想象。^③ 作为这一时期地图希伯来化的重要表现,地图中的“约旦河西岸”被置换为《希伯来圣经》中更为古老的名称——“犹太”(judea)和“撒玛利亚”(samaria)。^④ 这种命名的核心策略是借助《希伯来圣经》为现代以色列国家注入所谓的“神圣合法性”,表明该地区是其“应许之地”,从而宣告对该地区的“永恒主权”以及现代以色列和古代以色列王国之间保持着历史连续性。正如巴勒斯坦裔英国历史学家努尔·马萨拉(Nur Masalha)的研究揭示的那样,以色列地图的希伯来化采取的是利用古老的地名将占领行为包装成一种兼具“法理依据”和“历史性权利”的政治策略。^⑤

地图希伯来化作为以色列的一项国家政治文化建设工程,它的推行与以色列历史发展和中东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个系统性的过程共计为以色列国家地图上的各类地点、景观和遗址重新命名了近 9 000 个新名称。^⑥

(二) 以色列地图希伯来化的双重目的

以色列建国后地图的希伯来化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通过系统性的在地图上恢复犹太历史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名称,以色列希望建立一种民族

①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p. 186.

② Noga Collins – Kreiner, Yoel Mansfeld and Nurit Kliot, “The Reflection of a Political Conflict in Mapping: The Case of Israel’s Borders and Frontier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42, No. 3, 2006, p. 395.

③ Christine Leuenberger and Izhak Schnell, *The Politics of Maps Cartographic Constructions of Israel/Palest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 124.

④ 《希伯来圣经》记载所罗门王逝世后,统一王国一分为二,北部称为以色列,首都是撒玛利亚,南部为犹太,有时也译为犹地亚,首都在耶路撒冷。

⑤ Nur Masalha, *The Bible and Zionism: Invented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Post – Colonialism in Palestine – Israel*, Zed Books: London & New York, 2007, pp. 67 – 69.

⑥ Ben – Ze’ ev, *Remembering Palestine in 1948: Beyond National Narra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157.

集体记忆与巴勒斯坦土地的紧密联系，从而使犹太身份认同本土化，证明其历史延续性；另一方面，地图中巴勒斯坦的各类阿拉伯地名被抹除、转译，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及其历史文化的隐而不现，充分体现了去阿拉伯化特征。^①从根本上说，以色列地图的希伯来化是一个从象征意义上实现对巴勒斯坦土地声明、控制与占有的进程。

对以色列而言，为了发展建设一个民族国家，在地图上复兴希伯来元素成为恢复犹太民族空间的一个重要路径。^② 地图的希伯来化运动就是将犹太人的叙事、文化和历史融入其中，此举旨在强调犹太人之于这块土地的文化延续性。希伯来语地名作为历史悠久的文化符号，影响着犹太人感知、理解和想象他们的“应许之地”。^③ 用希伯来语将犹太历史与《希伯来圣经》中的文化元素重新命名在地图中，目的是建立起一种“民族起源”的叙事范式，进而拥有所谓的“原始权利”，同时也蕴含着对这片古老土地的救赎思想。^④ 在犹太复国主义者眼中，希伯来语地名对于拯救祖辈的家园至关重要。地名不仅代表名字本身，更代表着权利地位、集体身份与文化叙事。他们所宣传的逻辑是，犹太人的家园已经“屈从”于外来者太久了，巴勒斯坦人忽视了这片土地，给它刻上了陌生的阿拉伯语地名，因为数以千计的阿拉伯语地名仍主导着巴勒斯坦的地图。^⑤ 随着地图希伯来化进程的推行，大量用希伯来语重新命名的地名与景观都被抄写到地图上。这些名称增强了巴勒斯坦作为“圣经之地”的形象，同时由于希伯来语提供的历史深度也塑造了以色列对这片土地的所有权意识，强化了对这片领土的主张。^⑥ 特别是犹太历史与《希伯来圣经》中的名称在地图中的植入，构成了对土地的宪章性宣示与合法性来源，

① 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26, No. 1, 2005, p. 158.

②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p. 178.

③ Nadia Abu El - Haj, *Facts on the Ground: Archeological Practice and Territorial Self - Fashioning in Israeli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p. 85.

④ Lena Jayyusi, "The Grammar of Difference: The Palestinian/Israeli Conflict as a Moral Site", in Annelies Moors eds., *Discourse and Palestine: Power, Text and Context*, Amsterdam: Het Spinhuis, 1995, p. 124.

⑤ Efrat Ben - Ze' ev, "The Cartographic Imagination: British Mandate Palestine", in Smita Tewari Jassal and Eyal Ben - Ariet eds., *The Partition Motif in Contemporary Conflicts*, London: Sage, 2007, p. 115.

⑥ Saul B. Cohen and Nurit Kliot, "Israel's Place - Names as Reflection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Nation - Building", *Names*, Vol. 29, No. 3, 1981, p. 243.

表达了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土地上存在的历史连续性。^① 尽管历史和宗教并不是将民族身份嵌入土地的唯一手段，但以色列的地图作为国家基本组成部分之一，促进了犹太人对土地的原始依恋，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领土控制和主权要求。^② 例如，在以色列开展的考古发掘中，一些犹太圣贤坟墓与犹太会堂等遗迹的发现，不仅证明了古代犹太人存在的历史，这些考古文物地点也被以色列政府要求标记在地图之上。这样一来，对犹太文物的挖掘就形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地图弧线，也构成以色列扩大对当代巴勒斯坦土地要求的历史来源。^③ 与此同时，以色列地图的希伯来化也从心理上极大地影响了以色列人对地图的迷恋。以色列小说家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Orly Castel-Bloom）在其文学作品《多莉城》（*Dolly City*）中描述了关于地图铭刻在以色列人心中那份偏执。^④ 书中写到，“我拿起一把刀，准备切割，血水开始涌上横贯全国的河床。看到我儿子背上那张画得很业余的地图时，我感到一阵欣喜。尽管我的孩子痛苦地尖叫着，但我岿然不动。我凝视着那块雕刻好的艺术图形，那是以色列地的地图，没人会弄错的！”^⑤ 如果说文学作品中对于国家地图内化在以色列人心中呈现得过于夸张或痴迷，那么在以色列博物馆举办的名为“在地图上”的展览中，庆祝以色列人“即使闭着眼睛”也能画出这种形状的情感则是真实存在的，^⑥ 这表明巴勒斯坦这片土地的地理轮廓已经内化并深深铭刻在犹太人的意识中，而巴勒斯坦人被排除在外。

对巴勒斯坦人而言，犹太人为民族国家建设提供合法性依据而推行的地图希伯来化运动，更是一个文化空间层面的去阿拉伯化进程。为了重建与古代家园情感连接，以色列的政府命名委员会在对地图的希伯来化改造中，刻意抹去阿拉伯语的名称是整个过程的重要一部分。尽管地图中的阿拉伯语名

① Baruch Kimmerling, “Between Hegemony and Dormant Kulturkampf in Israel,” *Israel Affairs*, Vol. 4, No. 3-4, 1998, p. 51.

② David Newman, “From National to Post-national Territorial Identities in Israel-Palestine”, *GeoJournal*, Vol. 53, No. 3, 2001, p. 239.

③ Abu El-Haj, “Producing (Arti) Facts: Archaeology and Power during the British Mandate of Palestine”, *Israel Studies*, Vol. 7, No. 2, 2002, p. 50.

④ 奥莉·卡斯特尔-布鲁姆是以色列著名女作家，也是当今希伯来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

⑤ Orly Castel-Bloom, *Dolly City*, London: Loki Books, 1997, p. 44. 该小说曾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作品集》，而后又被提名为以色列建国后最重要的十部文学作品之一。

⑥ See Orna Granot, “On the Map Cartographic: Images of the Holy Land”, <https://www.imj.org.il/en/exhibitions/map-cartographic>, 2024-09-22.

称同样具有悠久的历史，然而犹太人基于《希伯来圣经》对巴勒斯坦古代地理的记述，将它们界定为“外来的”。对此，有以色列记者评论道：地图上的每一个阿拉伯语名字，即使此前从未有一个希伯来语名字，都应该被改写与清除。^① 学者诺加·卡德曼（Noga Kadman）在对1948年后巴勒斯坦村庄的研究中表明，为了消除这些村庄的存在痕迹，以色列在地图、路标、书籍、报纸和地形重塑方面做出了持续努力，尤其体现在巴勒斯坦地名在新的希伯来语地图上被删除或重新命名。^② 这导致巴勒斯坦人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与陌生感，尤其是那些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仍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③ 当大量的关于犹太人历史、《希伯来圣经》和犹太复国主义相关的名称充斥在地图之上，巴勒斯坦人将这一行为等同于犹太人对他们的民族历史文化“宣战”。^④ 同时，希伯来化地图的规模化印制与应用加速了去阿拉伯化的进程。具体而言，以色列政府在军事领域极力推广、分发新的地图，本-古里安指示军队只能使用新印制的地图，以此纠正士兵此前习惯使用阿拉伯语地图的倾向。^⑤ 教育领域同样如此。以色列政府规定学校必须采用更新后的希伯来化地图，目的是实现老师和学生的身份认同与建国后新的地理空间现实充分融合，并在无形之中承担遗忘、清除阿拉伯语名称的任务。^⑥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在特定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下查看到的地图，其中的社会关系就会不自觉地进入人们意识中。^⑦ 换言之，地图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的文本，哪怕是不经意的阅读也会将其内化。希伯来化地图在以色列全国的推广在地理意识层面塑造了以色列人的集体认同，同时造成了巴勒斯坦人的“被

① Julie Peteet, "Words as Interventions: Naming in the Palestine - Israel Conflict", p. 158.

② See Noga Kadman, *Erased from Space and Consciousness: Israel and the Depopulated Palestinian Villages of 1948*,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5.

③ Sandra Arnold Scham, "'From the River Unto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s': The 'Memory' of Iron Age Landscapes in Modern Visions of Palestine", in Mark Dorrian and Gillian Rose eds., *Deterritorialisations... Revisioning: Landscapes and Politics*, London: Black Dog, 2003, p. 75.

④ Sandra Arnold Scham, "'From the River Unto the Land of the Philistines': The 'Memory' of Iron Age Landscapes in Modern Visions of Palestine", p. 159.

⑤ Maoz Azaryahu and Ahron Kellerman, "Symbolic Places: A Study in the Geography of Zionist Mythology", p. 104.

⑥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p. 188.

⑦ [美国]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

沉默”与边缘化现象。^①

总而言之，以色列将地图的希伯来化视作一项凝聚、巩固犹太民族归属感与摆脱、清除阿拉伯文化的工程，即通过代表犹太历史记忆的文本符号与代表现代地理的国家地图之间的持续互动，目的是论证巴勒斯坦是独属于犹太人的民族家园。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希伯来化地图在肯定以色列国家“合法性”的同时，也反过来申明了自身的“准确性”。^②换言之，地图成为证明巴勒斯坦作为犹太家园的一种手段，以色列国建立的事实又成为这种手段的重要支撑。但以上逻辑理路是建立在忽视巴勒斯坦真实完整的历史之上的。从批判的角度出发，与其说“地图上以希伯来语命名的土地就是犹太人的财产”，^③不如说以色列通过希伯来文本对地图的覆盖性命名声明了对这片土地的控制与象征性所有。

三 以色列地图构造呈现的权力话语及巴勒斯坦人的应对

视觉符号是地图体现空间层次与秩序的重要元素。它主要通过地图上各种颜色的选择和类比、比例的缩放、各种符号的使用与控制来强调、突出或隐没、淡化某些信息。^④无论是一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绘制的地图，还是以色列以国家意志推行的地图，都利用了视觉符号的特性传递出直观或隐喻的视觉语言。实际上，地图在表达希伯来文化连续性以证明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建构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同时，更代表着一种权力话语，将巴勒斯坦想象、制造为“他者”。^⑤概括而言，以色列建国前后在利用地图对巴勒斯坦空间的排他性构建中，主要塑造了 3 种映射空间话语和等级秩序的形象。

① Maoz Azaryahu and Arnon Golan, “(Re) Naming the Landscape: The Formation of the Hebrew Map of Israel, 1949 – 1960”, p. 181.

② Denis Wood,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 p. 33.

③ Maoz Azaryahu and Rebecca Kook, “Mapping the Nation: Street Names and Arab Palestinian Identity: Three Case Studies”,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Vol. 8, No. 2, 2002, p. 195.

④ John Pickles, “Texts, Hermeneutics and Propaganda Maps”, pp. 208 – 211.

⑤ Christine Leuenberger and Izhak Schnell, *The Politics of Maps Cartographic Constructions of Israel/Palestine*, p. 33.

（一）“存在与空白”：犹太人回归的“合法性”来源

在 20 世纪早期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制作的各类地图中，巴勒斯坦的地理空间大多被绘制为“赤裸”与“空旷”的无主之地，这导致巴勒斯坦从地图上看起来是一块空旷贫瘠、没有其他民族居住的区域。^①同时，以犹太民族基金会为主的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则刻意在地图上强调犹太人的一些历史遗迹、定居点的存在，并将地图的标题写为“以色列地”。这种地图绘制的方式在犹太人之中产生了一种观念，即在世纪之交犹太人定居巴勒斯坦之前，这里基本上是空白的。这种有意识的视觉塑造，旨在传达出巴勒斯坦土地是犹太人的遗产与空间之间，进而获得世界各地犹太人的捐款和情感支持，最终为犹太人的回归与对土地的占有提供了所谓的“合法性”依据。这种在地图上“制造空白”的做法吸引大量犹太人移民巴勒斯坦并开展定居点建设，反过来又成为犹太人“固化存在”的现实基础。^②

实际上，关于巴勒斯坦是一片无主的“空地”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 17 世纪。这一时期西方主流历史叙事主要是基于欧洲中心主义塑造的“文明与野蛮”话语对东方进行的想象与定义。正如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认为的那样，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以表述；^③犹太复国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沿袭了东方主义，衍生出一种“想象的地理”^④，并强化了犹太人对重新回到巴勒斯坦的情感诉求。巴勒斯坦作为“空地”的形象在契合了犹太人回归故土的夙愿的同时，更与一个犹太复国主义口号——“一个没有土地的民族回到一个没有民族的土地”互为印证。^⑤毫无疑问，犹太复国主义机构绘制的地图中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没有任何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巴勒斯坦人在地图上成为这片土地的缺席者。除了

① Yoram Bar - Gal, *Propaganda and Zionist Education: The Jewish National Fund, 1924 - 1947*, p. 137.

② Joanna C. Long, “Rooting Diaspora, Reviving Nation: Zionist Landscapes of Palestine - Israel”,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Vol. 34, No. 1, 2009, p. 63.

③ [美国] 爱德华·W. 萨义德著：《东方学》，王宇根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 年版，第 73 页。

④ “想象的地理”是萨义德 1978 年在其著作《东方学》中提出的概念，意指某一群体、社会、国家或文明对自身之外的其他地方充满欲望、恐惧或幻想。

⑤ 它在犹太民族国家构建中是一个被广泛引用的口号。事实上，这是个谬论，19 世纪末巴勒斯坦人口约为 60 万。See Diana Muir, “A Land without a People for a People without a Land”, *Middle Eastern Quarterly*, Vol. 15, No. 2, 2008.

一些犹太定居点等有限区域外，地图上的土地作为一块开放的空白区域似乎在向未来的犹太移民和定居者招手，暗示巴勒斯坦土地是一个希伯来空间，是犹太人的遗产，而巴勒斯坦被表征为一块“等待开发的空白画布”。^① 梅龙·本维尼斯蒂（Meron Benvenisti）认为，巴勒斯坦人作为“白色斑块”无法进入犹太复国主义地图的空间机制之中，他们只是一个不构成任何形式的、随机的三维实体的集合。^②

1948 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使得 70 多万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地图上的空间也相应被剥夺。以色列政府相关部门将第一次中东战争中被摧毁的阿拉伯村庄和城镇从地图上抹去，其余带有阿拉伯语的地名亦被系统性删除。尽管此时以色列土地控制范围的外围仍有 100 多个阿拉伯村庄保留原名，但其数量之少恰恰凸显它们被以色列视作“外来者”的边缘地位。对以色列来说，这种有限的例外无法撼动以色列地图的希伯来化特征。^③ 实际上，这是一个以色列试图抹去 1948 年前的非犹太历史，同时赋予巴勒斯坦土地以犹太民族属性的叙事重构过程。在以色列的官方说法中，要么淡化战争带来的残酷性与人道主义危机，要么将巴勒斯坦人的逃亡描述为自愿出走。这种意识形态反映在地图中就转换成以色列刻意隐藏了巴勒斯坦人居住的地理位置，或者遗漏地图中的空间数据，用模糊、空白的手法占有那些战争后获取的土地。^④ 尽管同年 12 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 194 号决议，为巴勒斯坦难民的“回归权”（Right of Return）提供了法律依据。但以色列仍不受限制地绘制符合自身利益的地图。毫不夸张地说，以色列制作的地图在很大程度上是“巴勒斯坦人受压迫的空间几何”。^⑤ 以色列正是通过地图制作，系统性地抹除了巴勒斯坦社群的地理存在，同时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刻下犹太民族特征。对此，以色列的和平主义者尤里·阿夫纳里（Uri Avneri）曾说：“在 1948 年后以色列制作的地图上，有数百个巴勒斯坦人的村庄和城镇凭空消失变为空白了，

① Gary Fields, *Enclosure: Palestinian Landscapes in a Historical Mirror*,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 230.

②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p. 56.

③ Christine Leuenberger and Izhak Schnell, *The Politics of Maps Cartographic Constructions of Israel/Palestine*, p. 103.

④ Ibid., p. 108.

⑤ Farid Farid, “Terror at the Beach: Arab Bodies and the Somatic Violence of White Cartographic Anxiety in Australia and Palestine/Israel”, *Social semiotics*, Vol. 19, No. 1, 2009, p. 60.

这些地图比任何炸弹都危险。”^①

（二）“进步与退化”：犹太人占有土地的“合理性”依据

一般而言，地图中的绿色通常代表着自然环境的宜人和农业的先进生产力。一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便利用这种视觉符号将巴勒斯坦地图标记为绿色土地的极度缺失，人为制造一种巴勒斯坦人导致这片土地荒芜、休耕乃至变为沙漠的形象。与之对比，犹太人的回归与农业劳动使得自然环境和土壤肥力得以改善。^②实际上，这是“进步与退化”话语在地图上的具体展现，暗示巴勒斯坦人导致这片土地退化，只有犹太人才能带来农业进步，从而为犹太人占有土地提供“合理性”依据。

一些犹太复国主义代表人物均有关于巴勒斯坦土地干旱、退化、荒芜、贫瘠等方面的描述。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领袖亚伦·大卫·戈登（Aaron David Gordon）曾说道：“我们国家曾是流着奶与蜜之地，具有高等文化的潜力。而今与其他文明国家的土地相比，它更荒凉、穷困和空虚——但这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们对于土地的天然权利，预示着我们的回归”。^③西奥多·赫茨尔也曾在日记中写下他对巴勒斯坦的景观想象。他认为这里环绕着“贫穷、苦难和炎热”的环境并充斥着“阿拉伯式的衰败乡村”，^④满是无法耕种的石头地，表明这是一个“很难得以继续发展和取得进步的地方”。^⑤尽管自然条件恶劣，戈登、赫茨尔和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巴勒斯坦作为建立犹太国家的理想地点，并非无可挽救。他们相信犹太人通过体力劳作与农业技术最终能够改善、修复这片残破、衰败的土地，还可以进一步强化同它的纽带联系。^⑥对犹太人而言，这种说法的逻辑是，这片土地是上帝“应许”

① Salman Abu Sitta, *The Palestinian Nakba, 1948: The Register of Depopulated Localities in Palestine*, London: Palestinian Return Centre, p. 1.

② Diana Davis and Edmund Burke III, *Environmental Imaginaries of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6.

③ Yael Zerubavel, “Desert and Settlement: Space Metaphors and Symbolic Landscapes in the Yishuv and Early Israeli Culture”, in Julia Brauch, Anna Lipphardt and Alexandra Nocke eds., *Jewish Topographies: Visions of Space, Traditions of Place*, Burlington: Ashgate, 2008, p. 205.

④ Theodor Herzl, *The Diaries of Theodor Herzl*,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Marvin Lowenthal, London: Victor Gollancz, 1957, p. 279.

⑤ [英国] 迈克·克朗著：《文化地理学（修订版）》，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2页。

⑥ Irus Braverman, *Planted Flags: Trees, Land, and Law in Israel/Palestin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76.

给犹太人的，只有犹太人的拓荒与劳动才能带来土地救赎与现代化。^① 换言之，巴勒斯坦人的管理不善与能力匮乏导致土地的荒凉贫瘠，只有具备改造自然能力的犹太人才能复兴这片土地。这种改造自然的进步能力成为犹太人占有土地的辩护理由，并认为巴勒斯坦人不具备这种能力而将其排除在外。

以色列建国后的各类地图和地图集中也明确地提到了这样的一种进步能力。犹太人通过在地图上显示他们建国前后土地的改良与农业的进步，以此凸显其自身给这片土地带来的显著改变。泽夫·维尔内（Zev Vilnay）在《新以色列地图集》中描述：“耶斯列山谷（Jezreel Valley）在反复的战争和土著人的管理不善之后变成了一片瘟疫沼泽，几乎被遗弃了。犹太移民们承担了危险而艰苦的任务，他们排干沼泽，把疟疾肆虐的地区变成肥沃、多产的平原。基布兹的犹太居民用决心和毅力把巴勒斯坦的沼泽和沙漠变成了肥沃的花园。莫沙夫的犹太人辛勤劳作把显然不适合耕种的地区变成了肥沃的土地”。^② 1953 年，以色列举办了一个名为“征服沙漠”的展览，邀请了 49 个国家的代表到场观摩，目的是集中展示这个新兴国家对于内盖夫沙漠的开垦成就，从而显示犹太民族具有强大的改造与征服自然能力。^③ 与之相对应，地图中的内盖夫沙漠绘制出了成片的绿色点缀，凸显了犹太人让“沙漠开出花朵”、将“沙漠转变为伊甸园”的能力。^④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类似的地图都呈现出相同的主题，即一个干枯、缺水的荒郊野地在犹太人带来的进步能力下转变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的地区。犹太人通过回归故土前后对地图的视效比较，展现了犹太人到来后土地逐渐绿化的趋势，这些地图给人的印象是不断增长的绿色空间正在向那些贫瘠和未开垦的区域扩张，从而彰显犹太定居者在耕种与土地改造方面取得的成就。^⑤ 表面看来，这似乎印证了自赫茨尔以来犹太世界广为流传的“我们回到了这片被遗弃的土地，经过我们的种植，沙漠开出了花朵”。^⑥ 然而，以地图形式呈现的巴勒斯坦土地生产力情况并非

① Gary Fields, *Enclosure: Palestinian Landscapes in a Historical Mirror*, p. 8.

② Zev Vilnay, *New Israel Atlas, Bible to Present Day*, London: H. A. Humphrey, 1968, pp. 18–35.

③ Yael Zerubavel, “Desert and Settlement: Space Metaphors and Symbolic Landscapes in the Yishuv and Early Israeli Culture”, p. 233.

④ Uri Eisenzweig, “An Imaginary Territory: The Problematic of Space in Zionist Discourse”, *Dialectical Anthropology*, Vol. 5, No. 4, 1981, p. 267.

⑤ Christine Leuenberger and Izhak Schnell, *The Politics of Maps Cartographic Constructions of Israel/Palestine*, p. 99.

⑥ Iru Braverman, *Planted Flags: Trees, Land, and Law in Israel/Palestine*, p. 76.

客观现实。不可否认，犹太人的确在改造沼泽、沙漠等野性自然方面取得了诸多成效，但巴勒斯坦人也并非无所作为。有学者认为，犹太人所宣传的改造土地的进步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为“合理”地占有土地进行辩护。^①

（三）“安全与威胁”：以色列维护国家安全的“正当性”缘由

地图是一种可视化呈现、表达地缘政治叙事的重要媒介。在地图的平面空间内，一个民族国家常作为单独的政治参数出现，通过视觉映像上与其他单位的比较，产生相应的认知。因此，地图被认为是展现地缘政治最为直观的空间标识。^②“安全与威胁”论作为地缘政治中常见的话语体系，透过地图就转变为一种直观明晰的视觉语言。对以色列来说，巴勒斯坦连同整个阿拉伯世界都被视为对其安全的巨大威胁，这也导致以色列时常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一些先发制人、损害巴勒斯坦和周边阿拉伯国家合法权益的行为。^③

1948年以色列建国时，与周边阿拉伯国家拥有广阔的土地相比，自身的领土面积较小。面对这种国土面积对比悬殊的差距，以色列产生了一种对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深度焦虑和恐惧。^④这种悬置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带来的危机感也被以色列投射在地图之中。地图随之成为以色列塑造危机意识与传达自身空间脆弱性的强有力工具，利用地图的视觉语言呈现出以色列空间的狭长与脆弱是一个始终不变的主题。很大程度上，地图中映射的二元对立是预先设定和人为构建的，其目的是拆分或联结不同行为主体。^⑤具体而言，以色列在地图中将巴勒斯坦与其他阿拉伯国家构建为统一整体，其特点是土地面积“大”，并与以色列的国土面积“小”构成鲜明对比。以色列充分利用了地图中这种“大小之比”的修辞手法，用以满足以色列的情感诉求或使其各类政治、军事行动合法化。^⑥

① Gary Fields, *Enclosure: Palestinian Landscapes in a Historical Mirror*, p. 310.

② J. B. Harley, "Maps, Knowledge, and Power", in Denis Cosgrove and Stephen Daniels eds., *The Iconography of Landscape: Essays on the Symbolic Representation, Design and Use of Past Environment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 303.

③ Ghazi Falah and David Newman, "The Spatial Manifestation of Threat: Israelis and Palestinians Seek a 'Good' Border",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14, No. 8, 1995, p. 694.

④ Yigal Allon, "Israel: The Case for Defensible Boundaries", *Foreign Affairs*, Vol. 55, No. 1, 1976, p. 38.

⑤ Charles Tilly, *Identities, Boundaries and Social Ties*, Boulder: Paradigm Publishers, 2005, pp. 9 – 11.

⑥ Tamar Soffer, *The New Atlas of Israel: The National Atlas*, Jerusalem: Survey of Israel, pp. 128 – 133.

当以色列需要强调外部压力与威胁时,其所使用的地图就不再是以国家为中心主体的地图,而是将以色列这块窄小的土地嵌入包括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区域版图之中。此时,以色列在这种更大的地图之中变得肉眼难辨,而整个阿拉伯世界依然清晰可分。在这种情况下,颜色作为地图中的视觉组成,也参与到对地图受众的影响进程中。地图中的以色列常被作为中东地区间一条红色的狭长地带出现,而周围是用绿色涂注的广袤阿拉伯世界。^①从视觉观感层面来看,地图上代表狭小、红色的以色列与代表宽阔、绿色的阿拉伯世界营造了视觉上的强烈对比与反差,由此突显出以色列时刻处于阿拉伯世界包围下的窘境。

地图成为教育和塑造大众意识的重要工具。以色列除了利用地图表现出空间上的薄弱性外,更为核心的层面是要透过视觉观感所产生的危机状态去激发民族内部凝聚力。^②地图中的以色列作为更大的阿拉伯世界中间的极小一块,创造了被阿拉伯世界围困的视觉印象。这样的地图在引发犹太人深度焦虑的同时,也唤起并强化了民族深处的“围困心态”^③,犹太人的民族归属感也正是在极度不安全感的坩埚中才得以凝聚、淬炼。^④与此同时,犹太民族历史中的一些传说、事件也成为政治资源被加以改编与使用。部分以色列人认为,地图上所展现的以色列对比阿拉伯世界就如同《希伯来圣经》中以色列人大卫面对非利士人歌利亚一样实力悬殊明显,^⑤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也与公元 73 年罗马人围攻犹太人的马萨达堡处境类似,这种危机感使得以色列激发出即使面对巴勒斯坦与阿拉伯世界围攻也必须战斗到底的意识。^⑥事实上,这种“威胁论”经由地图视觉形象的有效传达,在以色列大众当中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借由马萨达神话所制造出的现代回响,以色列为在寻求自身

① “Arab - Israeli Conflict: Basic Facts”, <https://www.science.co.il/Arab-Israeli-conflict>, 2024 - 9 - 22.

② Arnon Medzini, “The War of the Maps: The Political Use of Maps and Atlases to Shape National Consciousness - Israel Versus the Palestinian Authority”, *European Journal of Geography*, Vol. 3, No. 1, 2022, p. 24.

③ “围困心态”是理解犹太人过去以及当前行为的重要角度。See Daniel Bar - Tal and Dikia Antebi, “Siege Mentality in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1992.

④ Donna Robinson Divine, *Exiled in the Homeland: Zionism and the Return to Mandate Palestine*, p. 205.

⑤ 按《圣经》故事,最终大卫战胜巨人歌利亚,比喻在实力悬殊的较量下以弱胜强。

⑥ Daniel Bar - Tal and Dikia Antebi, “Siege Mentality in Isra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Vol. 16, No. 3, 1992, p. 256.

安全中产生的一些损害周边国家利益的行为提供了心理与政策的双重理由。面对这种情况，以色列将巴勒斯坦连同整个阿拉伯世界构建为“集体威胁”，并进行污名化塑造，最终将其视为“恐怖”的代名词以及“暴力”的同义语。

（四）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排他性地图建构的态度与应对

巴勒斯坦知识分子普遍反对以色列的排他性地图建构，认为其本质是对巴勒斯坦历史、领土主权的系统性否定。他们将此类地图视作以色列侵占巴勒斯坦土地的象征，目的是通过构建犹太化的地理叙事抹杀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合法性。他们认为犹太人重返这片土地带有一种地图抹除机制，旨在将所有巴勒斯坦人的痕迹从地图上擦除。他们通过地图将巴勒斯坦人居住的空间留白，塑造一个白色像素化的无主之地来侵蚀巴勒斯坦的存在，最终完全消除这片土地的阿拉伯地理特征，以此造成巴勒斯坦人空间上的失语。^① 正如巴勒斯坦研究员萨尔曼·阿布·西塔（Salman Abu Sitta）所说，巴勒斯坦人的空间已经“从地图上被刻意地清除了”。^② 巴勒斯坦裔公共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进一步认为，以色列的地图是由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所驱动，试图使犹太民族与以色列国家建构计划合法化，同时隐藏和否认正在进行的对巴勒斯坦人的剥夺。^③

面对以色列通过地图建构排他性土地主张的局面，巴勒斯坦人将地图绘制转化为一种抵抗手段，试图通过制图实践留存民族历史记忆。遗憾的是，巴勒斯坦在1948年和1967年两次战争后流失了大量技术人才，面临制图专业资源和知识严重匮乏的窘境。^④ 这也使得巴勒斯坦人对地图利用显得十分迟滞，直到1993年《奥斯陆协议》的签署巴勒斯坦人才开始系统性地利用地图传达自身的政治诉求。^⑤ 对巴勒斯坦人来说，正是这种局面使得地图制作成为

① Ghazi Falah, “Israelization of Palestine Human Geography”,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Vol. 13, No. 4, 1989, p. 536.

② 萨尔曼·阿布·西塔因第一次中东战争被迫离开巴勒斯坦，他主要致力于绘制巴勒斯坦地图与制定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规划。

③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4, pp. 415-416.

④ Doumani Beshara, “Rediscovering Ottoman Palestine: Writing Palestinians into History”, in Ilan Pappé ed., *The Israel/Palestine Question: A Reader*,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 25.

⑤ Yair Wallach, “Trapped in Mirror-Images: The Rhetoric of Maps in Israel/Palestine”, *Political Geography*, Vol. 30, No. 7, 2011, p. 73.

一种“争取存在与被记住的权利，以及拥有并收回集体历史与现实的权利”的抵抗。^①

具体而言，巴勒斯坦人在巴以地图博弈中主要采取了两种应对策略。其一，进行传统地图绘制以保存民族记忆。这种方式主要表现在一些巴勒斯坦学者与民间力量出版相应的地图或地图集。例如，萨尔曼·阿布·西塔在自己的著作《巴勒斯坦地图集，1917—1966》中详细记录了1917至1966年500多个村庄的地理信息、战后巴勒斯坦难民的流向，以及以色列定居点的不断扩张等内容。^② 同样，一些巴勒斯坦民间组织在绘制地图中，着重标记那些在1948年之后数百个消失不见的村庄、城镇和遗迹，以此证明巴勒斯坦人的历史存在与保存他们被摧毁家园的记忆，并声明自身拥有天然的回归权。^③ 其二，利用数字化进行开放式制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2018年正式上线的“巴勒斯坦开放地图”（Palestine Open Maps）。它由一些巴勒斯坦研究机构基于多年来资料收集和地理数据处理联合开发而成。这是一个允许用户探索、搜索和下载巴勒斯坦历史地图和空间数据的平台，通过信息图和数据可视化，将巴勒斯坦领土碎片化过程转化为直观的视觉叙事。例如，用户通过访问网站可以对1948年前后的巴勒斯坦村庄分布进行交互式对比。^④

需要指出的是，在巴勒斯坦内部也存在一种声音，即将全部巴勒斯坦地区绘制进巴勒斯坦国的地图之中，将以色列完全排斥在外。这股力量不赞同根据现有形势绘制以西岸和加沙为主的地图，也不同意国际公认以1949年停战协定划定“绿线”为基准的巴以边界。事实上这也代表部分阿拉伯国家的观点。^⑤ 地图史学者丹尼斯·伍德（Denis Wood）认为，这是一种针锋相对的绘制实践，成为两种地图对峙中“以牙还牙”（tit-for-tat）的典型用例。^⑥

① Edward W. Said, “Palestine: Memory, Invention, and Space”, in Ibrahim Abu - Lughod, Roger Heacock, and Khaled Nashef eds., *The Landscape of Palestine: Equivocal Poetry*, Birzeit: Birzeit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1999, p. 12.

② See Salman Abu Sitta, *Atlas of Palestine, 1917 - 1966*, London: Palestine Land Society, 2010.

③ Meron Benvenisti, *Sacred Landscape: The Buried History of the Holy Land Since 1948*, p. 43.

④ “巴勒斯坦开放地图”官方网址: www.palopenmaps.org.

⑤ 需要提及的是，伊朗虽然不是阿拉伯国家，但也曾表达过类似的立场。例如2005年时任伊朗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声称“要彻底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消灭”。See Stephan Grigat, “Antisemitism of the Ayatollahs: Holocaust Denial and Hatred of Israel in Khamenei’s and Rouhani’s Iran”,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Vol. 7, No. 2, 2015, p. 165.

⑥ Denis Wood, *Rethinking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2010, p. 246.

综上所述，从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到以色列国，一直都在利用地图抹除巴勒斯坦人与这片土地相关的地理和社会印记，双方实力地位的差别更是加剧了地图话语生产机制的不对称性。^① 以色列建国前后利用地图中视觉符号将巴勒斯坦人排除在巴勒斯坦空间之外，其根本目的是申明自身对于这片土地的权利主张。以色列无论是在地图中将巴勒斯坦塑造为空白之地，从而等待犹太人的回归，还是认为巴勒斯坦人导致土地废弃衰败，唯有犹太人才能带来进步，抑或是巴勒斯坦连同阿拉伯世界是以色列安全的巨大威胁，无不透露着一种排他性的权力话语。然而，这其中也有深刻的矛盾与悖论所在。一方面，以色列不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存在，将其描述为一片空白，对该群体主观漠视；另一方面，以色列又认为巴勒斯坦不具备改造自然与现代化能力，还构成对以色列安全的威胁，实则认可其存在。进而言之，这种矛盾性充分反映出地图中所展现的权力话语很大程度上是以色列忽视客观真相的主观建构，这也使得巴勒斯坦人利用地图进行回应与抵抗。

四 结语

在以色列的国家建构进程之中，地图是充当知识工具与权力话语的深刻体现。犹太人作为流散的民族失去了身份认同中的地理维度，而犹太复国主义作为一种现代民族主义冲击了传统的弥赛亚主义，借由地图的知识工具属性，将现代意义上的土地概念融入犹太民族身份之中，唤醒了犹太人对昔日故土的空间构想，进而影响散居犹太人前往巴勒斯坦移民定居。以色列建国后，政府开始进行地图的希伯来化改造，通过希伯来语的地点与景观的再命名将希伯来历史文化和犹太复国主义政治愿景嵌入地图文本之中。丹尼斯·伍德指出，地图的绘制者时常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地图自然化，将其转化为常识性的民族话语，从而使其呈现为土地的客观表征，最终掩盖真实的意图。^② 在上述过程中，一些早期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以色列国把权力话语杂糅进地图之中，将巴勒斯坦呈现为“空白”“退化”与“威胁”的负面视觉形象，进而使犹太人的回归具有“合法性”、对土地的占有具有“合理性”，以

^① Alain Epp Weaver, *Mapping Exile and Return: Palestinian Dispossession and a Political Theology for a Shared Future*,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4, p. 5.

^② Denis Wood, *The Power of Maps*, New York: The Guilford Press, pp. 1 - 3.

及维护国家安全的行为具有“正当性”。概而言之，这类地图所塑造出的文明秩序和空间等级形象是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的空间实践，使犹太人身份、文化记忆和民族历史在地图上得以声明、陈述和表达。在此过程中，以色列尽管否认了对巴勒斯坦空间的争夺与抢占，但仍埋下了遗留至今的祸根，即以色列应如何看待、处理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与空间问题。这种排他性的空间构造使以色列至今仍受到国内与国际社会对其民族国家合法性的质疑与挑战。^①

从巴以冲突的层面来说，双方旷日持久的矛盾冲突除了反映在激烈严酷的现实层面，也很大程度上反映在没有硝烟的“地图战争”之中。关于土地与空间的争夺“不仅是关于士兵和大炮的，也是关于思想、关于形式、关于形象和想象的”。^② 当下，地图的博弈逐步演变为冲突的现实表征，巴勒斯坦不仅在土地控制的现实层面处于弱势地位，在以地图为代表的空间交锋中同样处于不利处境。对于巴勒斯坦人而言，及时而系统的开展所属领土调查与绘制地图，是构建一个完整国家合法性和功能性来源的重要支撑。可以说，在对地图进行技术性政治操纵方面，以色列比巴勒斯坦占据了非常大的优势。但换个角度而言，尽管地图一直被以色列用作排除巴勒斯坦空间的工具，但它同样可以作为巴勒斯坦人的一种抵抗手段和话语表达并以此争取正当权益。正如爱德华·萨义德所言，“历史上，地图总是由胜利者先绘制而成，但相反的绘制实践就会形成一种抵抗艺术”。^③ 最为关键的是，巴以双方对于地图的运用必须超越零和博弈的逻辑，彻底打破地图制作的主观预设、排他性的理念与工具化利用，承认巴勒斯坦是两个民族共有的家园，和平之光才能最终普照这方多难的土地。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① 即便在以色列国内，反对之声也一直没有停止过。主要表现在艾兰·佩普、巴鲁赫·基默林和施罗默·桑德等一批后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解构了传统的犹太复国主义叙事，揭露了以色列建国过程中的对巴勒斯坦人的排他性政策。还有一些以色列的和平与人权组织对与巴以和平相处的呼吁，如“现在就和平”（Peace Now）、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人权信息中心（Israeli Information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和以色列的非营利组织“佐赫罗特”（Zochrot）都通过揭露以色列系统性压迫巴勒斯坦人的行为，主张平等对待巴勒斯坦人，反对对巴勒斯坦人进行压迫，力求建立并维护以色列的人权文化。

② [美国] 爱德华·W. 萨义德著：《文化与帝国主义》，李琨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 年版，第 7 页。

③ Edward Said, *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sion: 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 p. 416.

development. Thus,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issue is not merely a territorial dispute but a localized manifestation of global capital dyna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duction of space, the settlements have engendered new class divisions, rendering both Palestinian and Israeli working classes exploited within this monopolistic structure. Only by breaking capital monopolies and restructuring class alliances can a genuine resolution to the Israeli – Palestinian conflict be explored.

Key words: Palestine – Israel issue; settler colonialism; Israeli settlement; religious Zionism; neo – liberalism; privatization

Knowledge Tool and Power Discourse: Israel's Exclusive Construction of Palestine Maps

Yan Tao

Abstract: Since the 1920s, some Zionist organizations have used maps as a knowledge tool to express the spatial vision of Palestine as the homeland of the Jewish 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dissemination and promotion of such iconic maps have also aroused emotional resonance among Jews around the world and attracted them to immigrate to Palestine. After Israel's establishment in 1948, state – led Hebraization of cartography emerged to integrate Jewish historical narratives with modern geographical consciousness. Consequently, thousands of locations and landscapes were renamed in Hebrew, creating “legitimacy” for Jewish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Israeli nation – building. Essentially, this practice constructed exclusionary spaces privileging Jewish claims while deliberately marginalizing Palestinian presence. Through cartographic representations before and after statehood, Israel shaped Palestinian space as the “Other”, establishing spatial hierarchies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progress and regression”, and “security and terror”. Thus, maps not only facilitated Jewish nation – building but also functioned as power discourse in spatial contestation over Palestin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dimension for examin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Jews and Palestinians.

Key words: the Palestinian – Israeli issue; map; Jew; Israel; Palestine

(责任编辑: 李文刚 责任校对: 樊小红)